



文思丛书

突破与变异

——16-17世纪儒学思想
变迁探微

曲 辉 著

Breakthroughs and Variations:
The Changes of China's Confucianism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曲辉，山东烟台人，博士。现为北方工业大学教师。



文思丛书

突破与变异——16-17世纪儒学思想变迁探微

镜像中国：20世纪中国电视批评史

严肃的变异——怪诞艺术研究

意境的诞生——以体验方式为中心的美学考察



责任编辑：唐颖

赵丽华

特约编辑：刘广东

封面设计：飞翔

- ◎ 自诞生之日起，儒学便处于不断地发展与变化当中，政治生态、经济形势、朝代更迭等因素都影响着儒学，而儒学往往也在理念与方法等方面顺势革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 ◎ 16-17世纪是儒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节点。王阳明心学在此期间创立，随后发展出各种流派，一时之间“阳明心学”蔚为大观。然而，王门后学有发挥阳明精义者，也有陷入“狂禅”“归寂”者；明清鼎革，王学末流的空疏备受指责，经世致用之学大盛，“以礼代理”说、考据学等活跃于当时。
- ◎ 本书试图对该时期儒学的发展与演变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梳理，同时将儒学发展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力图廓清源流，呈现儒学发展的原因、方向及面貌。

上架建议：文化艺术类

ISBN 978-7-5657-1601-0



9 787565 716010 >

定价：48.00元



文思丛书

突破与变异

—— 16-17世纪儒学思想
变迁探微

曲 辉 著

Breakthroughs and Variations:
The Changes of China's Confucianism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突破与变异:16—17世纪儒学思想变迁探微/曲辉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3

(文思丛书)

ISBN 978-7-5657-1601-0

I. ①突… II. ①曲… III. ①儒学—思想史—研究—中国—16世纪~17世纪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7702号

突破与变异:16—17世纪儒学思想变迁探微

TUPO YU BIANYI: 16—17 SHIJI RUXUE SIXIANG BIANQIAN TANWEI

著 者 曲 辉
责任编辑 唐 颖 赵丽华
特约编辑 刘广东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封面设计 飞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38千字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601-0/B·1601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导 论 / 1

第一章 明代政治环境与士人心态 / 31

第一节 “岂非骨鯁之臣已空于建文一代” / 31

第二节 “君子思不出其位” / 40

第三节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 / 58

第二章 明代学术的发展 / 63

第一节 “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 / 63

第二节 “盈天地间，只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 / 72

第三节 “日用常行”与“慎独”“意根” / 92

第三章 清代学者的反思及以礼代理的出现 / 106

第一节 “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 106

第二节 “吾辈今日学问正从日用常行中见” / 119

第三节 “以礼代理”的提出 / 131

第四章 儒学由内到外的转变及其影响 / 145

第一节 由“内在超越”到“外在规范”的转变及原因 / 145

第二节 清代士大夫气节之转变 / 156

第三节 “以礼代理”的困难 / 171

导 论

一、明末清初的若干问题

所谓的明末清初主要是指从明代正德、嘉靖至清康熙十二年平定三藩之乱这一段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儒学史上至关重要,第一,王阳明的心学是在正德、嘉靖时期创立和传播的。王学的兴起是中国儒学史上一大事因缘。王阳明学说创立的时期,是程朱理学被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并作为科举考试的规范读本的时期。王阳明自身也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并且是科举中的佼佼者。同时我们从王阳明的年谱中不难发现,年轻时的王阳明对程朱理学可谓笃信不疑并积极付诸实践。年轻时长期浸淫于程朱理学,不可能不对王阳明产生影响,即使是在其学说创立之后,这种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王阳明自身看来,他对程朱理学中儒学传统的坚持,并没有抛弃或者背叛,毋宁说,王阳明只是换了一个角度加强了这种坚持。而阳明后学对于这种坚持却并不抱同情的态度,这恐怕与当事人的生活和学术经历有关,同时也与王阳明过早逝世,对自己的学说没有更充分地解说有关。从哲学的角度说,王畿对于王阳明的理解是最为透彻的,他的“四无说”比钱德洪的“四有说”更能反映王学的本质。然后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正是这种透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王学的流弊。在明代晚期,影响最大的王学流派自然是“泰州学派”,这一学派组成成分十分复杂,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这种成分的复杂性,导致对王学的解说更为

新颖而纷繁，人人争立宗旨。所谓“牛毛茧丝无所不辨”。到了王学最后的重镇刘宗周，所有的二元对立几乎都打并归一，对内心的探求已经达到了至为隐微的“意根”，这一方面说明，心学的发展前景已不容乐观。同时又由于王学空谈心性的弊端日益严重，对于王学的不满便不足为奇了。经过了明清鼎革，当清初思想界反思明亡的原因时，王学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相对于王学末流的空疏无用，清初学者强调经世致用。他们或者由于不仕新朝，或者因为本无功名，因此这一时期的学者多是在民间提倡经世之学。但在中国的中世纪如果得不到朝廷的认可，经世之学便很难发挥大规模的作用。特别是当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将目光投向意识形态的控制时，这种经世之学更无用武之地了。

第二，康熙帝作为中国中世纪最有作为的统治者之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推崇儒学。这种推崇不出历代帝王的窠臼，依然是采取利用的态度。但是，康熙帝对儒学的了解和运用却比其他皇帝更为纯熟和彻底。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的皇帝，这就争取了一部分汉族学者的支持。康熙帝对于程朱理学也是推崇有加。从他提拔的大臣如李光地、汤斌等就可看出。但是，康熙帝对这些理学名臣的虚伪也有深刻的理解。他曾在康熙三十三年，召集翰林官员，出了一道题目“理学真伪论”，自己做考官，让他们做现场作文，然后大发威风，当场羞辱这帮平时以才学满腹自居的文士们，其中，言辞所及，还包括了康熙帝的老师熊赐履，以及已经去世的一些名儒，甚至骂这帮人是“假道学”。在提倡道学的同时，又以皇帝的威严痛斥当世最著名的道家学家们，其结果和目的自然是告诉人们：真正懂道学的是皇帝，真理只能在皇帝手中！当李光地将学统和道统拱手交给康熙时，不能不说李光地了解康熙的心思。在这种情况下，程朱理学只能成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很难再有学理上的创新。程朱理学在学理上更利于思想意识的统治，同时鉴于明末王学对思想统一的

破坏,程朱理学自然成为帝王利用的工具。

明中期王学的兴起,是在与程朱理学的对抗中完成的。程朱理学在明中期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过程,虽然程朱理学更为普及,但是这降低了程朱理学的质量,同时也降低了它在政权之外与政权进行抗争的功用。于是王学将理夺回来还给个人。时至清中期,这种情况似乎又进行了重演。国家对程朱理学权威的确立使得程朱理学获得了推广,但是它质量的下降又一次遭到了有识之士的批评。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反映了“假道学”在当时的数量之多和素质之差。于是,在当时兴起的考据学没有集中批评明末的王学,而是直接抨击程朱理学。其实,从时间上来看,王学更接近于考据学,明亡的原因更适合用王学末流的弊病来解释;而且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似乎更容易触动统治者那本已很敏感的神经。因此,明末清初这一段是一个轮回的时期,在这期间,有王学的兴起、发展和泛滥;有清初思想界对整个宋明理学的反思和经世之学的兴起,同时又有王朝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利用。这些在儒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第三,夸张一点地说,一部《明史》就是一部士大夫的血泪史。从洪武朝到崇祯朝,明代士大夫一直处在强权政治的压力之下,这种压力有来自皇帝的,也有来自权臣和宦官的。也许正是这种极端残酷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明代士大夫的气节。不论是朝堂之上的慷慨谏诤还是亡国后的从容就义,数量之多、情节之惨,堪称历朝历代之最。然而,明代士大夫对这种情况不但不以为怵,反而甘之如饴。民间学者也是如此。反观清代,我们不能不说,士大夫的气节已消亡殆尽。明代政治尽管残酷,还是出了张居正这样的权臣和海瑞这样的清官,可是随后的清代却一个也没出过。

同时,清代的一般学者甚至在人品上也无法和明代士大夫相比。众所周知的戴震《水经注》版本官司、段玉裁做县令的贪污事件、王昶借收徒敛财的事实等,都给他们的高大形象留下了污点。至于清代理

学家，桐城派可谓其中重镇，而朱维铮先生认为唯一可称“孝友严整躬行”者，方苞一人而已^①。由此可见当时理学家之一斑。也由此可见，气节人品之不如明代士大夫，是清代一个普遍现象。

在中世纪，对士大夫影响最为巨大的，莫过于政治和学术风气，如上所述，明代政治最为严酷。只是这种严酷多以对部分士大夫肉体的摧残表现出来，这种摧残激起的是士大夫更大规模的抗争，士大夫以遭受肉刑为荣，天下人以遭受肉刑者为荣。赵园先生将这种情况视为一种变态心理^②，诚然，但正是这种变态心理使得明代士大夫在面对统治者时更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遭遇奇惨，但是他们不辱儒学对政治批评的使命，其立身行事流传千古。参与编修《明史》的清代官僚便以“直声震天下”等评语表达了对这些士大夫的崇敬。清代统治者对士大夫控制的手段与明代相比，显得更为深沉而有效。如上文所述，康熙帝表面上对孔子的推崇居历代帝王之首，同时对理学也造詣颇深，但这不能仅仅认为他要从中吸取治国之道。康熙帝给所有臣民的印象就是，他已经掌握了儒家之理。正如上文中已经指出的，程朱理学有利于统治阶级，表现在这里就是，当统治者宣称其已掌握了“理”并通过政令法度等方式加以确认时，这种“理”的真实性还有多少呢？其结果必然是程朱一直坚持的通过“理”的掌握而实现道统对统治制约的程度便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乾隆对程朱理学的了解远不如乃祖，但是他采取的措施更令人觉得惊奇，他一方面提倡崇儒重道的国策，打击敢于与程朱立异的官员，如严词指斥谢济世和李徽；另一方面，他又提倡经学，特别是考据学^③，甚至容忍戴震等人对程朱理学的批评。这种做法很难不令人联想到“以汉制汉”。也由

① 钱锺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汉学师承记》，《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页。

②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③ 朱昌荣：《试论雍正、乾隆二帝的理学思想》，《清史论丛》2009年号。

此可见,康乾二帝都只是将理学作为统治工具而已。在这种情势之下,不论是理学家还是考据学家,怎么敢于真正地对程朱理学进行深入研究,进而提出有制于朝廷规定的学说呢?

从学理的角度看,宋明理学是将对性命之理的追求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结合起来实施的。程朱理学的“天理”虽然是独立存在的,但是当天理作用于人间社会时,这个天理就转化为人间社会运行的规律和秩序、转化成各种伦理原则和道德标准。朱子强调公共天理与个人身心豁然贯通的境界,当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天理与人心是合一的。虽然认为为外,使得这种合一费一转手,但是这并不是不可以实现的。当天理与人心合一时,个人的所作所为即符合天理的准则,也就达到了儒家学者追求的圣贤境地。

然而程朱理学追求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圣成贤。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特别强调了宋学包括程朱理学对治国平天下的执着。程颐一句“天下兴亡寄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将这种诉求表达得过于露骨,以至于遭到了后来的乾隆帝的激烈批评。^① 这种情况反映了士的地位在宋、清两代的不同。同样地,明代士的地位也无法和宋代相提并论,洪武、永乐两朝对士的残酷,已经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但是,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来没有在明代士大夫的心中消除。这一方面,王阳明也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少年王阳明和那时候的大多数士子一样,推崇的是程朱理学。十二岁时的王阳明就确立了“学圣人为第一等事”的志向。以后游历边关,学兵法。又因为研习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而成病,从此之后他就几乎没有和功令化的程朱理学合拍过。弹劾刘瑾而致罪遭贬、困居龙场,对王阳明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这使得他对政治局势和学术取向进行了深入的反

①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10—230页。乾隆帝的批评参见四库全书本《御制文》二集卷十九《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第863页。

思,在这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学说。

王阳明创立心学的第一步就是把天理还于人心。众所周知,程朱理学在两宋并没有被统治者定为一尊,它只是作为宋代众多学术流派的一种而存在,在北宋有司马光“涑水学”、苏轼“蜀学”、王安石“荆公新学”等,在南宋又有陆九渊“心学”、陈亮与叶适“浙东功利之学”。这种情况虽然使理学在当时没有像后来那样拥有广大的受众,但这时的理学却有独立的思考并在与其他学派的论争中获取营养,不断创新。明代程朱理学被定为国家取士的标准,一言一字不得更改,导致了明代前期的学术界“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情况。程朱理学失去了创新的条件和制约治统的条件。同时,士子只是将程朱理学作为进阶仕途的敲门砖,没有深入研究。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一方面反映了阳明对程朱的笃信,同时也反映出他并没有领会程朱理学的真谛,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何尝教人格竹子了呢?连王阳明这样切身体验程朱理学的人尚且如此,等而下者更无论矣。于是功令化的程朱理学无法也不能满足当时士子的需要情况,也就不难想象了。

同时,如上所述的政治环境无法使阳明实现“得君行道”的理想^①,王阳明在刘瑾事件之后,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的学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远接孟子、近袭陆象山,将理赋予人心,认为“心即理也”,又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道德行为“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②。这种说法一方面将“天理”从官方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使得人人皆可以获得天理,将超越外在不可企及的理归还于内在的人人具有的心。当然,这种理并不是天然本具、自然发露的,阳明承认私欲、习气等对人心的遮蔽,同时也提供了消除这种遮蔽的方法,那就是“致良

① 《明世宗实录》卷九十八,《明实录》,北京书局1983年版,第8035页。

②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修订版),《传习录》卷上,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30页。

知”；而良知则是人人本有的。这种简易直截的方法很快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并且涵盖了从士大夫到平民的广大范围。余英时先生指出，王阳明的学说走的是“觉民行道”的路子^①，从学理上看王阳明的学说也更容易为一般大众所接受。

与程朱理学相似，阳明心学也是强调心与理的合一。用理学的语言说，就是通过对世俗欲望和感情的克制，使人心渐渐达到“天理”的高度。一旦达到这种目标，甚至在真诚地追求这种目标的过程中，个人的道德修养无疑都将获得很大的提高。这从《明儒学案》中樵夫、陶匠等普通人皆可成为学者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反观清中前期，程朱理学依然被高悬为功令而毋庸置疑，王学更是少人问津。考据学只是作为少数精英学者的专利，普通人难以融入。并且考据学一向被认为缺乏思想性，虽然近几年已经有学者指出了隐藏在烦琐的训诂考据中的义理，但是这种义理不论是对治统的约束还是对个人道德的修养，其效果都不如宋明理学，这是毋庸置疑的。以近几年影响较大的张寿安先生的“以礼代理”说为例，张先生认为，“以礼代理”重视对礼学的研习，可以作为清学与宋明理学在思想上的分水岭。

张寿安先生指出，清儒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儒学思想从宋明理学的形式，转向为礼学治世的形式”。研究礼学，自然要涉及理与欲的关系，张寿安先生正是由此入手的。如他认为：“清初顾炎武提倡‘实学’思想，其后戴震建立‘以欲为首出之义’的新思想，到凌廷勘‘以礼代理’之说出，然后清儒‘通经致用、重欲务实’的学风，才有了前后承启的完整思想体系。”^②我们从这种论述中可以看出，重视“礼”的研究必须要以“欲”为首出，而“礼”是对“欲”进行限制使其合乎规范。同时，

①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余英时文集》第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② 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勘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第6页、第33页。

“礼”是外在的，循礼而行即使达到“动容周旋皆中礼”的地步，如何能保证行为中“礼”的同时“心”也合理？毕竟“礼”只是“理”的外在表现。其实，以人欲为首出、以礼加以节制，清初陈确已经有类似说法，黄宗羲批评道：“焉知不是荀子之性恶，全凭矫揉之力，而后至于善乎？……必从人欲恰好处求天理，则终身扰扰，不出世情，所见为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头换面耳。”^①

这里并不是说王学不重视礼，邹守益说：“予尝受学于阳明先生，获见虔州之教，聚童子数百而习以诗礼，洋洋乎雅颂威仪之隆也。……窃叹人性之善，无不可教，患上之人未有以昌之也……读而叹曰：是（指‘礼’）固人之形也！……仁也者，人之精神命脉也。……礼乐之文，非自外至也，自中出者也。”^②王学重视礼的作用，只是他们更重视礼的内核，更重视内心的修养和道德的提升，礼是必需的，但是不可以提到与“仁”与“理”相同的地位。可见，由于“礼”有具体的规范可行，又易于推广，因此，“以礼代理”有助于经世。可是在没有内在理的支持下，即使能做到循礼而行也不能保证循礼之人获得“礼义”，也就是“理”。这就会给部分“口君子之言，行君子之行，而心狗彘之心的人”以机会。上文已经指出清代学者人品的下降，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种下降是由于学理的变化而导致的，可是这种间接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二、王学内部在这一时期的变化及其影响

以上主要对比分析了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和清初学术特别是“以礼代理”思潮及考据学社会背景和学理方面的一些不同。当然，在明

① 黄宗羲、陈乃乾整理：《与陈乾初论学书》，《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42—443页。

② 邹守益：《谕俗礼要序》，《邹守益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末清初这一段,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阳明心学,理由之一就是全祖望总结的清初三先生:黄宗羲、孙奇逢、李颀,全部是王学家^①。只是这一时期的王学,处在全面修正期,黄宗羲在王学内部修正王学,孙奇逢、李颀则站在王学的立场上提倡朱陆调和。由此可见,王学确实出现了问题。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②其实,“失其传”者,远不止泰州学派与王畿。

要考察王学的流传,必须先考察其流派。目前对王学的分派影响较大的有《明儒学案》中提出的按照地域分派;牟宗三先生的按照学理分为浙中派的王龙溪、泰州派的罗近溪和江右派的罗念庵和聂双江;还有按照治学特点而分的现成派、归寂派、修正派;还有虚无派、日用派等。后两种分派有其自身缺点,如:现成派何尝反对一般的修证功夫?所谓“日用派”,自然是强调日用常行的工夫,但是对日用常行的重视,何尝是从明代才开始的?因此,这种分派只可以作为帮助理解,不适宜作学理的区分^③。倒是牟宗三先生的划分,以原始王学作为评判标准,对我们的研究不无启发作用。只是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划分是粗略的,以这种划分为指导是可以的,但是必须用横向和纵向的眼光来丰富这个划分。

横向的眼光是指,要考虑到与王龙溪同时的还有钱德洪,他们虽然同时聆听和记载了王阳明的“天泉证道”,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思路和风格,对后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罗念庵和聂双江的“归寂”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联系到他们之所以在良知之上另求本体,是因为当时学者认为良知太易,以至于出现太多“现成良知”和伪“良知”。王学的流衍和分化恐怕都要从天泉证道说起。《传习录》和《王阳明年谱》

① 全祖望:《二曲先生空石文》,《鲒埼亭集》卷十二,四部丛刊本。

② 《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20页。

③ 关于王学的分派可参见蔡仁厚:《王学流衍》,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